



语言在多大程度上左右我们的思维

曼维尔·辛格¹文 丁建新² 万江³ 朱星羽⁴ 姜美帆⁵ 陈永均⁶译

【摘要】在围绕语言是否塑造思维的长期学术争论背景下，曼维尔·辛格以印度达利特人创造“英语女神”寻求社会赋权的现象为切入点，探讨了英语作为全球性语言的影响力与争议。他回顾了从本杰明·李·沃尔夫颇具争议的假说到当代“新沃尔夫主义”的演进，并援引了关于颜色辨识、时间隐喻和嗅觉词汇等跨文化心理学实验，指出语言确实会如微风般微妙地“推动”而非绝对地“禁锢”我们的认知。他最终论证，尽管英语的全球扩张引发了文化同质化的焦虑，但其在世界各地的本土化演变生动表明，语言与思维处于一种动态的、相互塑造的关系中，而非单向的支配。语言影响着理解世界的框架，而使用者也同样在不断地重塑语言本身。

【关键词】语言相对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知塑造

- 1 作者曼维尔·辛格，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方向：文化演化、社会演化、认知人类学、进化人类学。邮箱：mvsingh@ucdavis.edu
- 2 译者丁建新，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方向：批评语言学、韩礼德语言学、新媒体话语分析、文化研究、学术翻译研究。邮箱：jxding8@sina.com
- 3 译者万江，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wanj33@mail2.sysu.edu.cn
- 4 译者朱星羽，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zhuxy263@mail2.sysu.edu.cn
- 5 译者姜美帆，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jiangmf6@mail2.sysu.edu.cn
- 6 译者陈永均，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邮箱：chenyj586@mail2.sysu.edu.cn。



How Much Sway Does Our Language Have over Our Thinking?

Manvir Singh¹ Ding Jianxin² Wan Jiang³ Zhu Xingyu⁴ Jiang Meifan⁵ Chen Yongjun⁶

【 Abstract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long-standing academic debates on whether language shapes thought, Manvir Singh examines the influence and controversies surrounding English as a global language, using the phenomenon of Dalits in India creating a “Goddess of English” to seek social empowerment as an entry point. He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is discourse from Benjamin Lee Whorf’s contentious hypothesis to contemporary “Neo-Whorfianism,” citing cross-cultural psychological experiments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temporal metaphors, and olfactory lexicon. Singh argues that language subtly guides—rather than rigidly constrains—cognition, much like a breeze shaping its path. He ultimately contends that although the global expansion of English raises concerns about cultural homogenization, its localized adaptations worldwide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s dynamic and mutually constitutive, rather than unilaterally dominant. Language influences the frameworks through which we understand the world, while speakers continually reshape language itself.

【 Keywords 】 Linguistic Relativity; Sapir-Whorf Hypothesis; Linguistic Influence on Cognition

-
- 1 Manvir Sing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Research Interests: Cultural Evolution, Social Evolution, Cognitive Anthropology,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Email: mvrsingh@ucdavis.edu
 - 2 Translator Ding Jian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Critical Linguistics, Halliday Linguistics, Discourse Analysis of New Media, Cultural Studies, Scholarly Translation Studies. Email: jxding8@sina.com
 - 3 Translator Wan Jiang, MA Candidat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wanj33@mail2.sysu.edu.cn
 - 4 Translator Zhu Xingyu, MA Candidate in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zhuxy263@mail2.sysu.edu.cn
 - 5 Translator Jiang Meifan, MA Candidate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jiangmf6@mail2.sysu.edu.cn
 - 6 Translator Chen Yongjun, MA Candidate in Foreign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Email: chenyj586@mail2.sysu.edu.cn



2010年，一尊约两英尺高的青铜新女神在印度北方邦的一个村庄亮相。她看起来与那些印度神话中的神祇截然不同。她没有难近母（Durga）的华美纱丽，也没有吉祥天女（Lakshmi）的奢华珠宝，而是头戴宽边帽，身披类似自由女神像的长袍。她既没有骑狮子，也没有驾天鹅，而是站在一台台式电脑之上。她也没有手持利剑或者长矛，而是一只手握着一支笔，另一只手拿着印度宪法——承诺将平等载入法律。她的名字叫安格雷兹·德维（Angrezi Devi），是英语女神，专为印度的达利特人，即“不可接触者”（untouchables）而设。

她的创造者、著名达利特人作家昌德拉·班·普拉萨德（Chandra Bhan Prasad）宣称：“英语女神可以赋予达利特人力量，让他们有机会摆脱数百年来来的压迫。”他认为英语是达利特人极其宝贵的资源。“会讲英语的达利特人难道会被期待去清理下水道和道路吗？”他发出质问，“会讲英语的达利特人难道会甘心在地主的农场里做卑微的劳工吗？”尽管他是一名无神论者，却设计了这位女神形象，企图将英语融入到达利特人的身份建构之中，以此推动他的族群摆脱封建的底层地位，迈向现代化与独立的行列。他写道：“学习英语已成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

他说得没错。据估计，全球约有15亿人会说英语，差不多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英语已然成为人类历史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正如罗丝玛丽·萨洛莫尼（Rosemary Salomone）在《英语的崛起：全球政治与语言的力量（牛津版）》（*The Rise of English: Global Politics and the Power of Language*, Oxford）中所言，英语在联合国、北约、世贸组织和欧盟中均享有官方语言地位，被冠为“全球最主流的通用语言”。她指出，同其他殖民语言一样，英语最初通过“武力征服、宗教传播和商贸往来”传播开来，但如今推动其传播的则是第四种力量，萨洛莫尼称之为“社会合谋”。全球范围内的人们都追求英语以及它所带来的机遇。萨洛莫尼观察到，“韩国母亲会将她们的孩子送往英语国家学习英语，荷兰的大学会用英语授课，东盟国家会通过英语开展合作，政治活跃分子则会用英语发推文。”

英语的扩张自然而然地引发了焦虑和反对。圣约翰大学法学教授萨洛莫尼一直关注着英语传播过程中所伴生的政治与法律层面的紧张态势。例如，法国几十年来始终在抗衡英语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及后来的欧盟）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局面。1971年，时任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发出警告：“如果随着英语的到来，法语不再是共同体的首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将不再是真正的欧洲。”（*Europe would never be totally European*）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的2018年，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也宣称英语在布鲁塞尔“处于过度主导地位”，并承诺将加大力度“教欧洲官员



学习法语”。

某种程度上，这种担忧反映了人们对文化身份被侵蚀的焦虑。而许多研究者还发现了英语传播焦虑背后的另一个原因：未来可能的认知霸权（*prospect of cognitive hegemony*）。他们认为，语言会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和回应。英语的语法、概念以及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在这些特性的共同作用下，可以构建出一种主观专断的现实认知框架（*arbitrary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有关这些影响的种种推测广泛存在，不一而足。以普拉萨德为例，他认为英语自身蕴含着一种平等主义特质，这是印度本土语言所欠缺的。他曾和我说过：“印地语里充斥着种姓偏见，从成语、短语，到谚语、笑话，乃至歌曲，无一不在贬低达利特人。在这种情形下，达利特人又怎会为所谓的‘母语’心生自豪？”而其他知识分子，如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i wa Thiong'o*），则认为英语不过是英美文化用以巩固自身地位的又一利器。2001年，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一个普遍存在的忧虑，他发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可能在使用英语的同时，不让自己的思维结构被英化？不被这种语言模式洗脑？”他的这种担忧是否有道理？

众所周知，语言会影响思维。如果我告诉你，我养了一只獾和二十二只金丝雀，你当然会对我的家庭生活有新的想象。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是，一种语言是否自身具有影响其使用者思维的特性：连续用西班牙语交谈一个月，会让人觉得物体更具性别属性吗？说英语而不是印地语，会让你不再那么种姓主义，进而更像是资本主义者吗？

如今，谈及这类问题时，我们往往会联想到本杰明·李·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他是一名火灾保险分析师，却在20世纪30年代在耶鲁大学学习语言学。在历史上，他既收获了诸多认可，也饱受误解。一方面，他的名字已成为语言影响思维相关的理论的代名词，即便这一理论的诞生实际上至少要比他所处的时代早出一个世纪。另一方面，又因为他所提出的理论太过激进，以至于在现代学者群体中，鲜有人愿意接受这份“殊荣”。

沃尔夫在一篇题为《习惯性思维、行为与语言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Habitual Thought and Behavior to Language*）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对比了英语使用者和霍皮语（*Hopi*）使用者的时间表达方式。在英语使用者眼中，时间是可量化、可分割的；而在霍皮语使用者的认知里，时间是更为连续的过程（至少沃尔夫是这样认为的）。基于此，他提出语言差异可能导致两个群体对时间流逝的理解不同。尽管观点大胆，沃尔夫论述时却相当谨慎。他只声称在语言和行为之间存在“可追溯的关联”（*traceable affinities*），并未给出任何确凿结论。他还着重强调，自己是“最不可能妄称这种‘关联’确实存在的人”。



但不幸的是，这些细节往往被忽视了。后来，沃尔夫竟成为语言决定论的化身，即语言是思维的最终裁决者。这种所谓的“沃尔夫主义”很快陷入了荒谬的境地之中：如果某种语言缺乏明确的将来时态，那使用者就无法想象明天；如果某种语言缺乏某些情感词汇，那么使用者将永远无法感受到这些情感。由此推论，不会说话的婴儿、猩猩以及所有无法使用语言的生物，似乎都无法进行许多基本的思维活动。

沃尔夫主义一直备受质疑。其中，一些最具说服力的反例来自那些无法生成或理解语言的个体。以法裔加拿大人修士约翰（Brother John）为例，时年五十岁的他患有间歇性失语症。1980年发表在《大脑与语言》（*Brain and Language*）上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他失去语言能力的时期，他大多数时候也能够正常生活。他可以操作复杂工具，执行事先交代的指令，有时甚至能够成功隐藏他的语言障碍。

哈佛认知科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对沃尔夫主义的谬误做出了许多评价。他举了一些常见的例子，用以否定语言总是先于思维的观点，比如说人们在脑海里搜寻恰当词汇的过程，以及为某种直觉去创造新术语的情况。在他1994年的著作《语言本能》（*The Language Instinct*）中，他得出结论，认为沃尔夫主义是“错的，完全错了”。如果我们从对沃尔夫的论点进行最极端的解读角度来看的话，这一评价是公平的。然而，最新研究中所展现出来的情况要更为复杂。沃尔夫主义是错的——但它并非全然错误。

朱莉·塞迪维（Julie Sedivy）在《语言爱好者：热爱语言的一生》（法勒、斯特劳斯与吉鲁出版社出版）（*Linguaphile: A Life of Language Love*, Farrar, Straus & Giroux）中写道：“我所掌握的每一种语言不仅有自己的发音模式和组词方式，还蕴含着特定的社会习惯，以及对宽容、谴责和尊崇对象的价值判断。”塞迪维出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在“语言混乱”的环境中长大，辗转于奥地利和意大利两地，最后定居在蒙特利尔。她在幼儿园时期就掌握了五种语言，而后致力于研究人们学习和处理语言的方式。她的书中包含了大量跟语言研究相关的科学知识，但科学本身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它与经验共存。因此，在这本书中，不仅有科学层面的知识输出，作者还将自身在语言领域的亲身体验融入其中。与其说这本书是一本标准的科普读物，倒不如说是一场关于热爱、驾驭和遗忘文字的诗意沉思。她察觉到，不同的认知风格与她所使用的不同语言息息相关。她把不同语言对认知风格的影响类比成不同性格的人在争着吸引他人注意。她写道：“不同语言在我的思维中产生的声音杂乱无章，它们相互影响，时而相互协作，时而相互干扰，却始终在争夺主导地位。”

像她这样的通晓多种语言的人，能够凭借其独特经历与感悟，促使人们对沃尔夫的观



点展开更为全面且深刻的思考。倘若语言并非像枷锁那般束缚我们，而是如同微风，从不同方向轻轻推动我们，那会怎样呢？这种更为温和的见解，更契合沃尔夫的初衷，因此，这一观点被称作“弱沃尔夫假说”。有人也将其称作“新沃尔夫主义”，但该命名乍看之下似乎与传统的“沃尔夫主义”有所矛盾。

一些新沃尔夫主义的研究已然成为经典。2007年，心理学家乔纳森·维纳韦尔（Jonathan Winawer）主持并发表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借助了这样一个语言现象：在英语里，只用 *blue* 这一个单词来表示蓝色这个颜色范畴。然而俄语中存在两个基础的颜色词汇用于区分不同程度的蓝色。其中，“голубой”这个词专门用来指代浅蓝色，而“синий”则表示深蓝色。实验表明，说俄语的人在区分与这两个词汇相对应的蓝色色调时，比说英语的人速度更快。

其他类似的研究则着眼于语言之间的差异，例如，不同语言对时间长短的描述（英语用 *long* 和 *short*，而希腊语用 *big* 和 *small*），以及对事件顺序的描述（英语中用 *B following A*，而汉语普通话中用“B在A之下”来表示先后关系）。相关研究还测试了这些差异是否与实验任务中的表现相关联。然而，许多语言学家对此并不以为然。在2014年出版的反对沃尔夫假说的论战性著作《语言骗局》（*The Language Hoax*）中，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约翰·H·麦克沃特（John H. McWhorter）认为，这类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揭示出来的差异极其微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并且，他认为这种微小的差异，很可能是由于心理学实验的特殊环境导致的。

迈阿密大学的人类学家兼心理学家凯勒布·埃弗雷特（Caleb Everett）在其著作《无数的语言》（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A Myriad of Tongues*, Harvard）中，得出了与他人不同的结论。埃弗雷特和塞迪维的成长经历颇为相似，两人都是在纷繁复杂的语言环境中长大。凯勒布·埃弗雷特的父亲丹尼尔·埃弗雷特（Daniel Everett）原本是一名传教士，后来转型成为了语言学家。凯勒布·埃弗雷特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巴西度过的，在此期间，他的父母会不定期地带他前往亚马逊地区，与当地的皮拉罕人（Pirahã）共同生活。皮拉罕人所使用的语言十分独特，其中没有用于表达数字和颜色的词汇，这种独特的语言现象极大地激发了埃弗雷特的好奇心，让他对语言和认知的多样性产生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浓厚兴趣。

埃弗雷特的著作深入探讨了语言之间令人意想不到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可能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开篇就谈及沃尔夫最感兴趣的话题：时间。对于英语使用者来说，他们会本能地将时间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几个范畴，但其他许多语言并非如此。卡里蒂亚纳语



(Karitiãna) 是埃弗雷特二十年前学习过的一种亚马逊语言，它只有两种时态：将来时和非将来时。而另一种亚马逊语言亚瓜语似乎有八种时态，其中包括用于描述发生在一个月到一年前的事件、即将发生的事件，以及预计在更遥远未来发生的事件的时态。

在研究语言如何影响思维这一范畴中，与沃尔夫主义更相关的是人们用来组织时间的隐喻。英语使用者一般从空间角度来理解时间，他们通常认为过去在“我们身后”，而未来在“前方”。艾马拉语 (Aymara) 是一种安第斯地区的语言，数百万玻利维亚人和秘鲁土著人都使用这种语言。同样，艾马拉语也借助空间概念来表述时间，但更倾向于使用与视觉相关的隐喻。在艾马拉语中，*nayra* 这个词，即“去年”，字面意思大致可翻译为“我能看见的那一年”。如此一来，可见的过去就位于说话者前方，而不可见的未来则在身后若隐若现。*Ancha nayra pachana* 意思是“很久以前”，大致可译为“在我前方很远的的一个时间”。研究人员在分析人们聊天的视频时，他们注意到这些隐喻会影响手势动作。熟练掌握艾马拉语的人在谈论未来时会向后指，谈论过去时则向前指。来自同一地区的西班牙语使用者却呈现出相反的手势模式，这表明语言会影响说话者将时间映射到空间的方式。

在通过特定的空间概念来描述时间这一现象上，艾马拉语使用者在这方面绝非个例。傈僳语 (Lisu) 属藏缅语族，该语使用者也有着类似的表达习惯，他们把未来描述为在自己身后，而将过去描述为在身前。埃弗雷特的研究发现，新几内亚东部高地使用的尤普诺语 (Yupno) 采用了一种独特的三维类比方式。在尤普诺语使用者的概念里，时间的流动就如同一条违背重力规律的河流：未来是朝着山上流动的，而过去则是往山下流淌。这种语言与艾马拉语一样，其关于时间的隐喻也会通过手势体现出来。尤普诺语使用者的手势指向取决于最近山脉的走向。此前，一些认知科学家曾做出这样的假设：无论世界各地的人类有什么独特的习惯，他们在思考时间概念的时候，都会借助空间隐喻的方式。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至少有一种名为图皮 - 卡瓦希布语 (Tupi - Kawahib) 的语言是例外。在图皮 - 卡瓦希布语中，不存在时间与空间之间的对应关系，不像其他很多语言那样，会用从左到右、从前到后或者从山下到山上等空间概念来对应时间概念。当研究人员要求图皮 - 卡瓦希布语使用者通过排列物品来表示一年中各个季节的顺序时，研究人员发现自己很难理解这些人所做出的物品排列方式。这些现象表明，语言不仅仅是一种交流工具，它还能使抽象的事物具体化，为人们理解时间等基本概念提供了特定的思维框架。

埃弗雷特在其著作中谈论了一众主题，包括语言在空间、数字和物体分类等方面的表达和认知差异，当中最饶有趣味的可能是关于感官词汇的探讨。西方学者长期以来的看法是，人类描述某些感官体验的能力天生有限，其中嗅觉是最难用语言形容的。我们可以用



语言抽象地描述颜色（红、蓝、黑）及声音（高、低、响亮）。但在描绘嗅觉时，我们通常只能借助气味的来源来帮助表达，例如用“像割过的草”来形容。然而，牛津大学的认知科学家阿斯法·马吉德（Asifa Majid）和瑞典隆德大学的语言学家尼克拉斯·布伦霍特（Niclas Burenhult）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他们发现，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边境，一个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贾海人（Jahai）部落拥有相当丰富的抽象嗅觉词汇。马吉德和布伦霍特在报告中表示，贾海语中 *ipit* 一词，可以形容“榴莲、香水、肥皂、沉香木和熊狸等散发的强烈气味”。*cnes* 一词则适用于“汽油、烟雾、蝙蝠粪便、蝙蝠洞、某些种类的千足虫、野生姜根、姜根植物、芒果木等气味”。后续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在方语（Fang）、高棉语（Khmer）、斯瓦希里语（Swahili）和萨波特克语（Zapotec）等至少 40 种其他语言中，同样存在大量的嗅觉词汇。

贾海语在嗅觉上的丰富表达与英语形成鲜明对比。马吉德和布伦霍特于十年前开展过一项研究，该研究要求贾海语使用者和英语使用者识别并说出包括肉桂、松节油、汽油和洋葱等在内的十二种气味。研究结果表明，尽管英语使用者对这些气味更熟悉，但却难以真正准确地描述出具体的气味。他们大多借助气味来源帮助描述，给出的答案各不相同，对于同一气味，彼此之间的感知和描述也存在分歧。一位英语使用者闻过肉桂的味道后回答说：“我不知道怎么形容那种甜，我尝过就像 *Big Red* 口香糖的味道，或是其他相类似的味道。我该怎么说呢，我找不到能形容它的词。天啊，应该就是 *Big Red* 口香糖的味道。可以这么说吗？那就 *Big Red* 吧。*Big Red* 口香糖。”然而，贾海语使用者相比之下却能更容易地描述这些气味，他们更擅长使用抽象的词汇来表达，且给出的答案相对一致。后续的研究对葡萄酒和咖啡专家进行了试验，即便是这些长期与气味打交道的人群，在面对非葡萄酒和非咖啡气味时，其识别与描述能力也不突出。该结果表明，贾海人强大的气味感知能力并非单纯源于他们长期接触不同的气味。相反，恰恰是贾海人日常生活中不断使用抽象的词汇对气味进行标签分类，才使得他们对熟悉或不熟悉的气味都能更好地感知。

嗅觉方面的探索只是马吉德牵头的大型研究项目中的一小部分，该项目的研究结果颠覆了学界对人类如何谈论感官知觉的普遍科学认识。至少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许多学者都假定存在一种感官层级：视觉和听觉是最容易被大脑识别的，也最容易用语言表达，其次是味觉和触觉，最后才是嗅觉。对此，马吉德和她的同事们提出了质疑，并采用了一种称为“可编码性”的衡量标准，用来衡量语言使用者对感官表达的难易程度。当来自相同语言群体的成员在受到感官刺激后，要描述相同的目标时，若能集中用一两个抽象的标签进行描述，则表明其可编码性较高。例如，让英语使用者描述停车标志的颜色，他们几



乎能用相近且明确的词汇来回答。反之，如果要求英语使用者描述芜菁甘蓝的味道，他们就可能给出参差不齐、冗杂繁复的回答，也就意味着其可编码性在嗅觉方面较低。

马吉德和她的团队还选取了二十种广泛分布各地的语言进行研究，当中包括三种没有关联的手语。该研究测量了这二十种语言在五种感官上的可编码性。英语是这些样本中唯一来自西欧的口语语种，也是唯一一种在视觉和听觉方面表现出高度可编码性，却在其他感官上表现出低可编码性的语言。研究人员发现，可编码性的显著差异普遍存在。当英语母语者在描述触觉时（如砂纸、毛毡、橡胶等）会感到词不达意，更为困难，但像马里的多姆多古尔语（Dogul Dom）和加纳的斯乌语（Siwu）等其他语言的使用者则往往能在描述时给出相对一致的答案。此外，在许多包括老挝语（Lao）、波斯语（Farsi）、尤卡坦语（Yucatec）和粤语等在内的其他语言，味觉则是五种感官里最容易表达的。

当研究人员将目光投向英语、与英语相近的西班牙语和德语，以及其他大型语种（如汉语和阿拉伯语）之外时，他们遇到了长久以来被认为不可能的现象。二十年前，人们认为抽象的气味词汇似乎很荒谬。布伦霍特花费了 10 年时间研究贾海语，它的博士论文研究的正是贾海语语法。后来马吉德让他做了一系列实验，发现贾海语使用者在谈论气味时确实有其独特方式。以往，学界常将时态、人称代词，甚至名词与动词间的区别视作普遍存在的语言特征，但在对更多的语言进行详细研究后发现，并非所有语言都是如此。同样，这也丰富了我们映射概念中隐喻使用的认知。英语使用垂直隐喻（高 - 低）来描述声学音高，但音乐认知专家的一项研究发现，世界各地的人至少使用 35 种其他映射方式，比如小 - 大、警觉 - 困倦、漂亮 - 丑陋、紧张 - 放松、夏日 - 冬季，甚至一些传统的津巴布韦乐器演奏家使用动物的声音来描述声音高低，如“鳄鱼”（低音）- “鳄鱼后的人”（高音）。

埃弗雷特的书深入探讨了这一系列新发现，这些发现成倍增加了语言差异的想象空间。在近期对以往文献的回顾中，语言科学家达米安·E·布拉斯（Damián E. Blasi）和马吉德等人一起，总结出了许多英语可能影响到的认知领域，包括记忆、心理理论、空间推理、事件处理、审美偏好以及对节奏和旋律的敏感度等。语言塑造了我们生活的世界，这不仅仅依靠几条语法规则，更多地是通过无数细微的差别。约翰·麦克沃特（John McWhorter）的看法也许是对的，任何单一语言特征的影响都是微小的。但也正如艾萨克·牛顿在研究微积分时所意识到的那样，正是无数微小的一，成就惊人宏大的亿。

普拉萨德的英语女神本来应该在 2010 年 10 月 25 日面世，被安置在一个用黑色花岗岩打造的神庙里，墙上雕刻着科学公式和一些伟大英文作家的名字。但这一天并未如期而至，当地政府阻挠了神庙的建设。据普拉萨德回忆，当地的一位官员透露说，是北方邦的首席



部长库马里·玛雅瓦蒂 (Kumari Mayawati) 决定的。玛雅瓦蒂自己就是达利特人，她办公室里摆着为她歌功颂德的雕像，被达利特人心中视如神般的地位。据一位印度记者的传闻说，玛雅瓦蒂之所以禁止建神庙，是因为她想做“这个国家唯一的达利特女神”。2012年她离职了，普拉萨德希望神庙的搭建能重新提上日程，但并没有。又过了五年，北方邦选举约吉·阿迪亚纳斯 (Yogi Adityanath) 为新任首席部长，他来自印度人民党，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和教徒。这样一来，搭建英语神庙的机会更加渺茫了。

自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掌权以来，印度人民党就是印度的执政党。莫迪是茶贩六个孩子中的老三，他不像印度独立后掌权的那些高血统官僚，操着口英文。他反对甘地和尼赫鲁主张的世俗、多元的印度，他一直致力于将印度变回一个只信奉印度教的国家，语言则是他举措的中心。英语象征着印度被帝国主义占领的过去，还有不受控制的精英们，而印度语，这一源自梵语的“大众之语” (language of the masses)，被重塑为共同身份的化身，尽管只有约40%的印度人会说印度语或者其中一支方言。

关于英语在印度的地位，虽然普拉萨德不同意印度人民党的理论家的观点，但他们都一致认同英语的强大。且不说英语带来的经济发展机会，他们更将其视为一股社会心理力量，其根在外邦，像印度教的神圣的三神一体，能够创造、维序或者颠覆社会秩序。他们都同意布迪厄的观点，英语的广泛传播代表一种认知霸权，这可能是恩赐，也可能是诅咒。

不过，关注到最近文化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我们就能发现英语的统治力并非那么大，它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有同化力。印度人民党想要弱化的英语，并不是英国两个世纪前带进来的那种。这样的英语很爱用进行时 (比如 I am going to school every day, 意为“我每天都去上学”)；发音方式发生了改变，会卷舌发辅音 (发 dog 音的时候将舌头卷曲呈鱼钩状)，以及将爆破音发成不送气的清音 (发 kick 不送气)；Kindly do the needful and prepone our meeting to tomorrow itself, na? (把我们的会议延期到明天，你知道该怎么做的对吗?)”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请求；一些敬语像 ji、sir 和 sahib 已经本土化，有着印度人才懂的细微差别。在次大陆浸润了几个世纪的英语已经印度化了。

这种语言的本土再加工数见不鲜。在新加坡，英语和马来语 (Malay)、泰米尔语 (Tamil)、闽南语还有其他亚洲语种融合，形成了特别爱说 lah (啦，增强语气) 的新加坡式英语，非新加坡的英语使用者很难听懂这种克里奥尔语。七年前，BBC 就开始提供西非洋泾滨英语的线上新闻，有超过一亿人说洋泾滨英语，而它深受非洲本土语的影响，以至于语言学家认为它成了一种有声调的语言。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为了适应说话者的需求和文化背景，英语改变自身框架以适应和融入新环境，再如牙买加方言 (Jamaican patois)



和新几内亚的巴布亚皮钦语（Tok Pisin）。就此而言，没几个语言比英语更能体现语言的持续发展性了，历经千年的武力征服、宗教传播和商贸往来，英语已经有 70% 的非日耳曼词汇，语法体系更简化，更有利于其传播。

布尔迪厄说得没错，语言模式会影响我们。然而，基于最佳的人种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他对洗脑的恐惧被夸大了。如果说话方式可以改变思维方式，那么反之亦然。这两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正是我们让自己理解世界，并让人类之间互相理解的一部分，这正是关于人类对话的真正内涵。

（责编：王儒蕴）